

观和社会组织间相联系这一观点的探索。许多发式具有宗教礼仪的特点,为低等级神服务的女祭司剪去她们的头发或者用白棉布把它扎上;高等级的那些人有二种选择:一种是编成几股长辫后末端绑扎成一圆锥体,也可选择将头发挽成五个髻的方式;第二种发式叫做 akuku、akoko、akukuli, Dangme 人和 Ga 人两个地方都有。Akuku 是在正中一个髻的四周也盘上发髻,中间这个髻代表“聚集的头。”在 Prampram 和 Old Ningo 镇,这种发式是服务于本地神,且是知识渊博的女祭司的特权表示,所以说 akuku 发式代表资深的女祭司。

通常,整个的节日庆典中,按习俗必须梳 akuku 发式的女祭司,为此,为了这个独特的宗教仪式,她得蓄一年的长发。发式的简洁展示加上皮肤上画的白粉纹样,暂时地增强了精神状态而能获得赞美。

akuku 发式使人想到各种隐喻。例如,akuku 发式被比喻为如同衣服垫到头顶上一样,能承重物。按照 Asafoatse Addicole 的说法,酋长和宗教巫医发髻需排列成炉灶形,虽然它与传统 Dangme 炉灶并不相似。Addicole 解释说,炉灶支撑着煮锅,如同神支撑着 Prampram 城,这就是 akuku 发式的一个代表作用。在仪式中,还要用鹦鹉羽毛装扮插在头顶上或插在中间的髻上。鹦鹉羽毛使人联想到祭司职责的繁重负担,以此强调女祭司作为神的代言人这一角色。

Akuku 及其它宗教随身用品,如草帽和珠子,也使用在女孩的成年礼 Dipo 上。这表明普通的宗教服饰包含有另外的内涵。Dipo 背景下的 akuku 发式象征着 Dangme 成年礼带有宗教的纯洁性。现在巴塞尔博物馆档案中的一张 19 世纪后期的照片,提供了 Dangme 的 Krobo 和 Shai 女孩们在成年礼中采用 akuku 发式的相关历史资料。居住在 Volta 河东边 Agotime Kpetoe 镇的 Dangme 人现在仍梳这种发式。据该族的民间传说,他们是 18 世纪从 Prampram 附近的海边小镇 Kpone 迁徙来的,所以至今仍保留着 akuku 发式以及 Dangme 服饰的一些其他特征。下面将列举这一带祭师在仪式中使用的主要道具。

帽 子

帽子即是祭师们借以展示其宗教影响力的道具之一。最受尊敬的是 Komipee——一种由椰树纤维编织而成草帽,Dangme 人称之为 soni。这种草帽为高级祭司所专用,女祭司也不能戴它。草帽编好后要涂上白色泥巴,此外,因其重大的宗教意义,Komipee 都须经过特定的洗礼,然后保存在专门的房里以备女孩成年礼上使用。祭司们在加冕前要经过 Dipo,以纯净自己的精神境界。Komi pee 用具宗教魔法的物质——椰纤维制成,象征与远祖的联系。Prampram 地区 Digble 海神的祭司头领,就有一顶装饰有红鹦鹉羽毛的 Komipee。他宣称,鉴于这个帽子与生俱来的神力,,他一年仅在 kpledzo 节目中戴一次,在这种场合,他通常享有最高贵的位置——全是木雕装饰的凳子。仪式过后 komi pee 又放回神庙的保管室直到下一年的 kplepzo 节。帽子与凳子的同时出现,表明了在 Prampram 镇和 Dangme 地区的其它地方,它们二者通常的象征功能。Old Ningo 镇的 Nene Hargo Taffa 解释说用草帽加冕是神赐予的大幅。Huber 也声称,在 Dangme 的 Krobo 人相信戴了这个草帽就是坐在神的中间了。综上所述,为了实现某种宗教上的目的,草帽,借助特定的宗教艺术形式,而转化成了促进与神灵沟通的道具。

金属装饰物

虽然黄金装饰物用在中层首领们的服装上并非为体现某种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Dangme 祭司们从根本上排斥所谓“红金属”——金或铜的合金制成的所有饰品,认为它们破坏了神的力量。黄金也被看做属于物质的东西和为了展示的东西,他们认为黄金饰品光耀了佩戴者而不是神。所以包括 Old Ningo 的酋长,由于他所处的位置等同于 Jange 神的祭司首领,也不能够使用金铜饰品,如果他违反了这个规定就会感染上麻风病。另外,银子象征温和、柔软,它受到祭师们喜爱的程度超过金子。男女祭司佩戴最为耀眼的金属饰品,包括象征“魔力”的铁铸铃铛和长银链。同样,高等级的女祭司们也用有象征意义的银发夹来装饰她们的 akuku 发式。戴银饰品表现了一种自我奉献、自我否认以及对于神的意志的完全屈服,在这里,宗教上的需要转化了人们

的审美情趣。

衣 服

宗教服饰在样式方面的一系列限定。Taka 或 bojuwe 被认为是古代服饰。Taka 是一种简单的扎在腰上和腿间的缠腰布,据欧洲旅行家 Paul Isert 所称,18 世纪后期 Ga 和 Dangme 人曾使用过它。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现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服饰。过去,仅在诸如节日和为氏族中的老人、酋长、祭司举行的葬礼这样的宗教仪式中,才穿着这种服饰。

总体而言,过去的两百年中,Dangme 宗教服装的主要成份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但也部分地受到外界的影响。在 Prampram, 宗教仪式服装则一直在变更,某些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

更早时我提到过性别的重要性,这关系到 Dangme 人是怎样对他们的神进行分类的:没有哪个地方象 Prampram 一样,与男神和女神相关的宗教服饰之间有如此根本的区别。今天的 Prampram 女神祭司用昂贵的欧洲面料把自己胸部以下全部包裹起来,然后在胸部和腹部系上一块红布。为男神服务的祭司则身着长袍,并在其服装的连接处加了块红布,系在肘和脖子上的黄色丝带,过去原是庆典集会上象征男神的标志,现在已不再出现。此外,男神祭师还要戴一种名为 panama 的欧式草帽。

In Prampram 宗教服装中,这些外来的很值得注意。Prampram 人自己承认它们不是原始的服装款式中的部份。要找到这个款式精确的原型是困难的。当我 1988 年 8 月访问 Accra 的 Ga 人祭司头领时,清楚地看见了他在宗教场合穿的这套源自欧洲的服装——腰间斜穿着白色的丝绸女式长袍,戴着一顶大草帽。他说这是一件复制品,是早期的欧洲参观者赠予他祖先的,一直保存在祭司室里。1850 年,瑞士布道会的传教士们在 Prampram 地区传教,Prampram 人使用 panama 草帽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因为宗教服装的这种变化仅仅存在 Prampram 地区,与 Dangme 的情况相比,这种对欧洲影响的反应更为独特。

然而,后面的调查没有揭示出是否在现代 Prampram 社会可能存在奴隶的问题。Prampram 的老人们不承认事情象附近社区所报导的那样,即 Prampram 曾输入过 19 世纪从哥伦比亚和西非的部分地方归还的奴隶,没人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因它相当犯忌。许多人转而谈论一些后来搬迁过来的家庭,介绍他们自己的神。或许这段历史的确存在过,人们只需要看一看 Bahian Candomble Nago 所穿的宗教衣服,便看出他们与大洋彼岸的联系。

19 世纪巴塞尔布道团从 Prampram 带回的两张照片,从中可看出,在 1880 年左右,宗教服装方面这些外来的成分,已得到镇上的人的认可。第一张照片拍的是 Marte Akoto Klegneti,海神 Digble 的祭司头领,旁边是他常坐的凳子,还有大地神 Lalue 的女祭司。另一张相片上仍是她,旁边坐着一老者。因为现代 Digble 神的祭司头领只在每年的 kpledzo 节庆才穿这种衣服,可以假定两张相片可能是偶然拍成的。最近照片带回了 Prampram, 图片上相似的传统宗教服装,证明了 Dangme 服饰艺术的长久存留。

Dangme 宗教的自我装饰明白显示了与所崇拜的神有关。总体上看,宗教服装传递了关于等级、性别和宗教联盟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元素构成了男女祭司间社会等级的基础。宗教服装也反映了宇宙与社会之间的联系。Dangme 人把感觉到的精神世界当作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而自我装饰和宗教仪式再次证明反映了存在于 Dangme 人两个世界中的强制与和谐。

总之,Dangme 宗教艺术不是过去的再现,是因为它们几乎全都保存时间短暂,它所产生的永久性的社会象征物,如凳子这类东西和纹身一样,留存也很短。他们在自我装饰上的不断实践不仅增强了对效果的信心,也给了宗教艺术无限的创造空间。在 Dangme 人的人生观中,坚持自我装饰的传统思想比艺术的发明创造更重要。N.A.M.kole 和 Manga Krobo 的 Konor 曾经都谈到:“一个人不能抛弃他所不能领悟的原始东西。” Dangme 人坚持使用这些艺术形式的一贯性显示出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变革中,这种将个人的信念与宗教自我装饰的结合将会继续下去。

Tellem 和 Dogon 物质文化的比较研究

R.M.A. 本道克斯

降水略显丰沛,水份蒸发缓慢,土地比周围地区更肥沃。居住在这种悬崖洞穴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外人很难进得来,这使得 Dogon 人直至今日仍保持着完全独立的生活方式。然而,尤其是在过去的 15 年中,深刻的变迁已经发生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势力在这一带进一步渗入,到这里来观光旅游的游客也与日俱增。过去的六十年中,人口已增长了将近四倍,与此同时,地区的降雨量却戏剧般地减少了。

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

对于本杂志的读者,已没必要对 Dogon 文化作更多的概述,然而,专门针对研究的某些方面作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仍是必要的。关于 Dogon 文化与 Tellem 文化——早先居住于这一地区的另一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是值得专门讨论的主题之一。本文将以考古发掘,人种学方面的调查,以及对主要流传在 Sanga 地区的 Dogon 族口头传说的研究为基础,展开对 Dogon 与 Tellem 物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不仅仅只停留在对该地区的历史作一番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

我将在 Sanga 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化遗迹以及创造这些文明的族群命名为“Toloy”——首次发现这类遗迹的洞穴所在的峡谷名。这些古老的文化遗迹包括 40 多个用泥土盘绕堆砌成的谷仓。谷仓墙体外表光滑,外表面上却有清晰可见的纵向的手指划痕。谷仓的顶盖中央饰有用手指在一层薄土上画出来的图案。一些手工制作的印纹陶碎片混在墙体内,墙内还发现有残余的草药。此外,没有人工培植谷物的痕迹,这些谷仓已被证明是建于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2 世纪,与附近的位于 Bani 河流域的 Jenne - jeno 文化遗迹属同一时代。

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1 世纪,Tellem 文化留下了最古老的遗迹,而这段时间,在 Sanga 地区却没有留下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由于 Toloy 文化与 Tellem 文化在年代上相隔了 11 个世纪之久,而且物质文化上的差异也很大,很难说两者之间有关系。然而,因为一直没有发现属于 Toloy 文化的人类遗骸,关于二者联系的假设就既没有被证实也无法证伪。

大约在 11 世纪到 16 世纪期间,Tellem 人陆续迁到这个地区。他们往 Bangiagara 悬崖的迁徙可能与由 Ghare 族的衰落而引起的往东、南方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相关。Tellem 人所用过的洞穴的数量,以及洞穴中遗存的大量的 Tellem 人骨骸表明,该族群的人口密度最初是很高的,但在 13 世纪后开始降低。

Tellem 人使用这些洞穴有三种用途:作为安葬死者的墓穴,作为举行葬礼的场所,作为储藏食物的仓库。死者下葬时全身着装,包裹着毯子,通常有一定的随葬品。进入墓穴的入口用一种晒干的泥砖筑墙密封起来。有些情况下,旧谷仓也可作上述用途。葬礼的一部分是在墓穴下方一个专门的洞穴中进行的,这类洞穴的地上通常零乱地放置着一种特殊的陶器,显然不同于日常用的那种。一部分墓穴中竟安葬有将近 3000 具遗体。就发现于各个洞穴中的遗骸头盖骨尺寸来看,他们均属同一种群。

Tellem 人已开始农耕生产(粟、大米),同时也采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此外,驯养动物(骆驼、山羊、绵羊等)、狩猎(水牛、羚羊、瞪羚等)也是他们食物来源的一部分。然而,很难说清到底哪种生产方式,哪项食物来源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原因。这一带的农业生产一直很不稳定,一旦雨季没能按时到来,或没有足够的降水量,就很容易导致饥荒。直到最近,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饥荒使得各种疾病更容易到处蔓延,阿拉伯人的史书中就有关于这段时期的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的记载。从 13 世纪起,Tellem 族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综上所述,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亡是必然的。这里也并不否认有一部分 Tellem 人可能已被融入其他民族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Tellem 人的数量应该很少,不足以与其融入的民族之间形成民族学上可测量的文化形态差异。

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在 Tellem 族和 Dogon 族的物质文化之间的进行的研究。首先,Dogon 族的起源不明确。在该族的创世神话中,关于其文明发源地就有至少三种说法。北方(Diyigou,湖泊以北?),西南方(Manda, Bamako,西南部?),南方(Yatenga,位于 Burkina Faso)。至今没有考古资料可以支持任何一种说法。不同地区的 Dogon 族群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差异(例如,某些地方的 Dogon 人没有面具,此外,语言、建筑技术、制陶技术等方差也很大)。从这些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Dogon 文化渗入的不同程度。地理上的分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地域文化差异,在几个所谓的文明发祥地都没有发现任何与现代 Dogon 文化相似的特征。(比如在 Niani,据估计是古代 Mali 人的首都之一;Jenne - Jeno, Toguere Galia 和 Toguere Doupwil,湖泊地区,Yatenga 地区等)第二,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 Dogon 族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我们实际掌握的唯一资料,来源于在 Hombo——17 世纪保存至今的 Dogon 早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仅此当然不足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今天 Dogon 文化内部的地域间差异比当时更为显著了,但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必须先将当代 Dogon 人和当代 Tellem 人的物质、文化作一番比较。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我和几个荷兰籍研究人员,从 1983 年到 1986 年,在 Sanga 地区的所作的考古学调查的发现。尽管这些调查在方案设计上有些教条,但将当代 Dogon 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我们仍从中收集到不少物质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

第三,我们关于 Tellem 人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全来自对其墓穴的考古发现,而关于 Dogon 人的这些资料则主要依靠对其住宅的调查,基于这样的材料进行研究,多半是不完善的。当然,大多数随葬品的情况表明它们并不是专门为这一目的制作的。一些枕头显然使用过,一些碗和锄头也如此。皮手镯通常都有戴过的痕迹,有一件样品甚至是修理过的。

在这期间 Tellem 人居住的遗址上,至今都仍未发现这种陶器。Tellem 人的村寨可能就座落在 Bandiagara 悬崖脚下,这可以说明他们的文化遗迹不是被埋在 Dogon 人的废墟之下,而是已被后来的 Dogon 毁掉了。还保留有 Tellem 人遗迹的洞穴则是因为长期无人居住,才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

14 世纪以后,Tellem 文化在建筑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早期的建筑用的是手工制造的泥坯,先经过太阳晒,使其变硬,然后结合灰泥砌筑成的。从 15 世纪起,Tellem 人的建筑全采用石构造。

根据 Dogon 人的口头传说,早在 15 世纪,他们就已在 Sanga 地区建立了最早的居住地。Griaule 在 Dogon 村落 Ibi 的一个洞穴里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传说中提到的这个年代。Griaule 在那里发现了九个在 Sigui 仪式上使用的面具,这种面具每隔 60 年制作一个,由此可推断,其中最古老的那个面具制于 15 世纪初期。附近一带流传的一些与 Dogon 人在此建立居住地有关的传说,也证实了这一年代的可靠性。

在距今最近的 Tellem 墓穴中,考古学家们找到了一些极罕见的陪葬的动物遗骸(海龟、鹤),而一般常见的随葬品在这里却几乎没有。在 Dogon 族的创世神话中,是“鹤”将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故乡 Mande 带到这片悬崖地带的,海龟也是这类神话中的重要角色。洞穴中发现的鹤和海龟遗骸经鉴定正是 15~16 世纪留下来的,这个时间正好与 Dogon 人声称的迁徙至此的时间吻合。然而,就在同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人类遗骨,就体格尺寸来看明显是 Tellem 人的一个亚种。而更晚期的洞穴(17 世纪~18 世纪)中所发现的遗骸却又不能归于 Tellem 种。因此,在这个距今最近的 Tellem 墓穴中的考古发现可以解释为 Dogon 文化在建筑技术及丧葬习俗方面,对同时代的 Tellem 文化产生了影响。

据 Dogon 族的传说:当 Tellem 人离开 Bandiagara 悬崖时,Dogon 人随之迁徙到 Hombory,进而到 Yatenga,据说就是现在的 Kuvumba 人。为了证明这种说法,考古学家们调查了 Hombori 一带许多洞穴遗址。发现这一带遗留下来的建筑及其它方面的物质文化都迥异于 Tellem 文化,同时,在洞穴中发现的人类遗骸也被证明不属于 Tellem 族。对现代 Kurumba 人的人种学研究表明,他们也不是 Tellem 族人的后代。

既然 Tellem 人不是 Dogon 人的祖先,也不是周围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那么,关于这一族群如何在 15~16 世纪后逐渐消失,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从阿拉伯人的史书中,我们得知正是在 15、16 两个世纪中,Songhai 人和 Mossi 人曾侵略过这片地区。从 Tellem 人那段时间居住洞穴的数量以及遗骸的数量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口的急剧减少,外族的入侵也许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但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原因。这一带的农业生产一直很不稳定,一旦雨季没能按时到来,或没有足够的降水量,就很容易导致饥荒。直到最近,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饥荒使得各种疾病更容易到处蔓延,阿拉伯人的史书中就有关于这段时期的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的记载。从 13 世纪起,Tellem 族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综上所述,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亡是必然的。这里也并不否认有一部分 Tellem 人可能已被融入其他民族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Tellem 人的数量应该很少,不足以与其融入的民族之间形成民族学上可测量的文化形态差异。

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在 Tellem 族和 Dogon 族的物质文化之间的进行的研究。首先,Dogon 族的起源不明确。在该族的创世神话中,关于其文明发源地就有至少三种说法。北方(Diyigou,湖泊以北?),西南方(Manda, Bamako,西南部?),南方(Yatenga,位于 Burkina Faso)。至今没有考古资料可以支持任何一种说法。不同地区的 Dogon 族群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差异(例如,某些地方的 Dogon 人没有面具,此外,语言、建筑技术、制陶技术等方差也很大)。从这些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Dogon 文化渗入的不同程度。地理上的分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地域文化差异,在几个所谓的文明发祥地都没有发现任何与现代 Dogon 文化相似的特征。(比如在 Niani,据估计是古代 Mali 人的首都之一;Jenne - Jeno, Toguere Galia 和 Toguere Doupwil,湖泊地区,Yatenga 地区等)第二,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 Dogon 族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我们实际掌握的唯一资料,来源于在 Hombo——17 世纪保存至今的 Dogon 早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仅此当然不足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今天 Dogon 文化内部的地域间差异比当时更为显著了,但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必须先将当代 Dogon 人和当代 Tellem 人的物质、文化作一番比较。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我和几个荷兰籍研究人员,从 1983 年到 1986 年,在 Sanga 地区的所作的考古学调查的发现。尽管这些调查在方案设计上有些教条,但将当代 Dogon 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我们仍从中收集到不少物质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

第三,我们关于 Tellem 人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全来自对其墓穴的考古发现,而关于 Dogon 人的这些资料则主要依靠对其住宅的调查,基于这样的材料进行研究,多半是不完善的。当然,大多数随葬品的情况表明它们并不是专为此目的制作的。一些枕头显然使用过,一些碗和锄头也如此。皮手镯通常都有戴过的痕迹,有一件样品甚至是修理过的。



和 Swazi，所有的人都想加入同一个社团的分支。然后同年龄段的人结成一组，(这点在这些地区中的大多数都是相同的。)虽然 Sotho 地区的社团并非一

定要具有这一特征。从这些社团中男人和偶而可见的妇女的资料情况来看，大多数圆雕就来源于社团。尽管已有了这个简单实用的资料，从 1935 年开始，大多数研究非洲艺术的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就开始着手分析 von sydow

族，把众多雕刻技巧娴熟、手法仔细的圆雕，从“南非”归类到“Zulu”。大多

数雕像就被称为“古代人像”了。虽然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Zulu 人曾经使用过这类东西。使人联想到在十八世纪后期，Zulu 的年轻人按年龄的划分，被安

排进军队而导致社团所有形式的逐渐瓦解。此事发生在大约 1802 年，这是

Zulu 周围制作人物像的社团可能存在的最后时期，到此为止人像还能保存下

来的概率就极少了。研究从前的文章，特别是 Nguni 南部诸如 Fingo、Bhaca、

Tembu、Pondo、Mpandomise 和 Galeka 这些地方，没有找到他们曾经使用过人像

的证据。

看来把存有疑惑的许多雕塑确定为是 Zulu 人的作品的依据，是男性人像

时常戴有一个头圈这个现象。在 Zulu 人中它是仅仅适用于勇士的发型，同时

也是男人到了结婚年龄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但是到了 Mfecane 时期 (Shaka 和

Dingane 与近邻发生战争)，Zulu 内部发生了分裂，谋反他们的头领取而代之

以新人，只是所有地方仍保留原有土地范围和此地的象征符号，包括头圈。而

且，这些 Nguni 社团接触到其它氏族时，头圈发型常常被照搬。如可在 Pedi 地

区的雕塑中、Mozambique 地区的 Tsonga 部落酋长和 Chopi 部落酋长的旧照片

中见到。从所获得的 Gazankulu 地区的资料来看，这对男人像和女人像的头

圈，均是用在加入会团的时候，头圈也用于赠给富有作战经验的勇士。

此外，欧洲收集品中戴有头圈的人像和相似风格却没戴头圈的人像区别

清晰，某些是早期的作品，如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的 1983 年登记入册的两件雕

刻品，一年前被公之于众。它们的出处精确指明来源于 Transvaal 地区的

Spolken 部落和“Magwamba”(Transvaal Tsonga 的小支系)。另一对雕刻品，1895

年被它们的收藏者阿道夫·恩皮罗捐献给了维也纳的佛瑞·维拉克奎德博

物馆。博物馆档案记载着它们来自于“居住在东非 Portuguese 地区的 Shanga-

kaffirs 部落”。尽管有与之相反的证明，此类风格的人像经过八年时间的论证，

终于被确认为 Zulu 人的了。

此问题变得复杂是由于在 Zulu 地区也收集到风格相似的雕刻有人头的

木桩。另一类戴有 Zulu 传统发式的女人像或狒狒像木桩，准确地记录表明，它

来自 Zulu 族。它们中的许多可能的确是由 Zulu 雕刻匠做的，而就我们所知，

Zulu 地区北部 Tsonga 族的雕工和铁匠也为 Zulu 顾客服务，因而可能也雕刻过

这样的人像，毕竟“商品流通”嘛。

对于风格相近塑像的分类仍有疑惑，现在，从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和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的样品上得到论证。大英博物馆的样品已被威廉

·弗格确认为属于 Zulu。这显然是根据风格来定的。它确定无疑地来自

东部和西部非洲的 Wellcome Foundation 人。弗格看到过这片分散地区，把早期

第四，用作研究的随葬品都是选自保留得比较完整的遗址，因此不一定都很典型。Tellem 人的墓穴随葬品多半是死者的遗物：衣物、饰物、私人用品等，因此，在现代 Dogon 社会中并不一定都有相应的物品，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Tellem 人的随葬品多是使用过的，也很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随葬品这个概念。

最后，我们无法确知哪些物品的生产在整个西非草原地区是普通的，而哪些又或多或少是由专门的人来完成。我们甚至无法确知在今天的 Dogon 社会生产中这种分工是否清晰。例如，皮革制品和皮匠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金属制品和各种珠子则来得更远。带足的陶碗又是一例：它本是 11—12 世纪 Tellem 文化的典型代表，却被发现广泛地分布在 Niger 河流域，而且显然不同于当地出土的其他陶碗。尽管有上述种种历史资料方面的局限，我们接下来还是可以在 Tellem 族和 Dogon 族的物质文化之间作一个简要的比较。

Dogon 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头和灰泥，通常住宅墙面要涂上装饰用的灰泥，谷仓则用搅均的泥灰浆来涂抹表面。现在 Dogon 人用的谷仓多是矩形平面的，偶尔也有圆形的，过去则都是用石和灰泥砌成圆形的谷仓。Tellem 人的谷仓几乎都是圆形或局部呈椭圆形，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一种经日晒变硬了的手工制泥坯。两者的谷仓都带有转轴门和门锁。在最晚期的 Tellem 墓穴中发现的谷仓已经同 Dogon 人的很相似了。

Dogon 人采用 Paddle - and - anvil 技术生产的印纹陶与 Tellem 人的很相象，只有局部的细微差异。Dogon 制陶者用的是石头拍子，而 Tellem 人则用陶的。两者晚期的陶罐罐口都更突出了，显然都使用了同一种弯折的支撑物。这种罕见的 paddle - and - anvil 制陶技术已证明是 Tellem 文化和 Dogon 文化共有的。枕头则只在早期 Tellem 社会中出现过，在今天的西非仍很罕见，而且确实不是 Dogon 文化的产物。

Dongo 族和 Tellem 族的男子都穿戴棉质束腰外衣和头巾，但两者款式不同。双层披肩在双方社会也都很普遍，但款式和图案不同。皮围裙——几乎是 Tellem 男子的日常装，在 Dogon 社会，男人们只在宗教仪式上穿着。

在早期 Tellem 社会，妇女通常穿一种编织极为复杂的植物纤维裙子。今天的 Dogon 男子在跳面具舞时也穿着一种粗犷的植物纤维编织裙。在发掘的唯一的 Dogon 墓穴中找到一块最古老的女用棉质缠腰布，大约是 17—18 世纪的物品，与早期 Tellem 文化的同类织物相比，这些缠腰布的幅面要窄得多。

和皮腰带、皮口袋一样，皮质鞋子和皮靴也是 Tellem 和 Dogon 都有的，但在形式上仍有区别。Tellem 式的鞋子通常带有护踝，且有所装饰，与 Dogon 式的形成鲜明对比。Tellem 人皮靴上绘有繁琐的几何风格图案，Dogon 人的则只嵌饰着少量的三角形或菱形图案。因为这一带马很少见，故今天马靴也很罕见，不过 hogn — 当地一种政教领袖，则一直穿这种靴子。另外，Dogon 人不佩戴编织的皮手镯。

铁戒指、铁手镯在两种社会都很普遍，但样式不同。Dogon 人至今仍使用木质、骨质、铝质的发簪，而 Tellem 人则使用一种扭曲的、带涡纹饰的铁簪。石珠子也是两者都有的，不过 Dogon 人喜欢稍大一点的、排列稀疏的珠串，而 Tellem 人则更喜欢多面的玛瑙珠子。水晶的柱状唇塞是早期 Tellem 社会特有的饰物，Dogon 族现在已没有这种东西了，而在本世纪之前，西非仍有一些民族使用这种饰物，也许其中就包括了 Dogon 族。众所周知，Dogon 文化的一些女人雕像就戴有唇塞。

Dogon 人的篮子编织法种类比 Tellem 人的更多。两者同是使用木匙，Tellem 人的木匙雕刻得很精美，而 Dogon 人的则多半是粗糙而不加修饰的木杓或葫芦勺。此外，两种社会都有葫芦制成的工具，不管是有盖的或无盖的、带绳网的还是系绳套的。

Dogon 人有超过十五种不同类型的手斧和斧头，而只有其中两种出现在 Tellem 墓穴中：一种有穴，一种则带有可转动的手柄。铁剑通常佩戴在死者身上。一直没有找到过 Tellem 人使用的刀子，但在随葬品中，佩戴在死者手臂上的皮刀鞘十分常见。Dogon 人则通常是将刀鞘挂在腰带上。弓和箭仅在 Dogon 葬礼上才仪式性地使用，他们用的箭头和箭袋与 Tellem 晚期的样式很相似，但是弓弦不一样。Tellem 式的弓带有刻痕，且两端分别有一个孔，弓弦是扭结成一股的皮带子，Dogon 式的弓两端纤细，弓弦则用一种劈开的细竹片代之。

乐器在 Tellem 人的墓中是很罕见的，他们的竖琴在外形上与 Dogon 人的

历史和 Zulu 人的雕塑的传说

安东尼·内特尼德

事实上，修饰简朴的传统非洲雕刻艺术，可与曾经存在于南部大陆的中、西非的雕刻艺术相媲美，这个观点被大众广为传播和普遍接受。这种说法已被南非政府写进了《移民和参观者指南：南非的黑人》(1975—1984)中。这些小册子上的看法是，黑人在珠宝和陶器方

面有技巧，但在修饰丰富的雕刻品上却没有，而那是“真正的艺术”——这个观点流传甚广。许多国家的黑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所秉呈的艺术天赋。想知道为什么这种说法被如此广泛地接受，首先必须看到它处于研究南

